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一種闡釋

丁亞平¹ 袁萍²

摘要：作為文明母體，黃河承載着展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與精神核心的重要作用。回顧中華文明漫長的發展歷程，彰顯並弘揚黃河文明的特色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重塑其起源與發展機理迫在眉睫。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作為闡釋黃河文明的新方向，既是對黃河文明進行探索和詮釋的新興手段，亦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中華民族；民族共同體；黃河文明；主體實踐

黃河文明是中華民族重要文化遺產之一，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念和精神內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文明的母體，它是維護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和對外交流的文化主軸，然而在全球化這個進程中黃河文明的特色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對其文明的形成、發展機理的重塑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自現代化的進程以來，人類的生活實踐、生命體驗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不斷加速的所謂現代社會裏，回望文明的源頭至關重要。西漢以來，因河

¹ 丁亞平，寧波大學包玉剛講座教授，北京電影學院特聘教授。

² 袁萍，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電影管理博士研究生。

而衍生的“大陸”“大野”¹之詞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大禹治水“告厥成功”後華夏文明的版圖和行政區域業已成型。因此對於四大古文明的起源，有一個有趣且形象的說法——人類文明是怎麼來的？是大水衝來的。“黃河寧，天下平”²。在這四大古文明起源中，黃河流域的個性應該算是最獨特的，不算太溫和，特別有韌性，也因如此，由此起源的中華文明能夠延續今日仍光輝燦爛，而其他古文明則未能如此。

黃河既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一直發揮着主導作用，並引領和影響着其他文化，有着豐富的時代內涵。從時間上看，黃河文化誕生於新石器時代，隨着原始農業的發展而逐漸壯大；從空間上講，黃河介於草原和長江流域之間，在融合北方遊牧文化的同時，又向南方進行文明的輸出，在多種文化的聯繫與作用中形成了異質多元的黃河上中下游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體化。

黃河文明在歷朝的更迭、穀物農業的生長、日益豐富的風俗文化中不斷壯大，有關民族的記憶與身份認同的構建在其流域脈絡中生生不息。以空間和載體價值存在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既是闡釋黃河文明的新方向，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舉措。於此，作者結合黃河流域區域的發展實際，從三個方面探討並闡述觀點。

¹ 王子今：《黃河文明研究的新成果——評介〈黃河文明的歷史變遷〉叢書》，《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14—15頁。

²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79—8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

一、作為主體實踐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首先，從實踐層面來看，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一種主體性實踐，體現了中國特色文化發展的自主性和主體性。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黨中央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部署下，首次提出“國家文化公園”¹概念。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黨中央計劃到2023年基本完成長城、大運河、長征三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任務。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黨中央正式提出建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戰略性舉措，將黃河流域及其沿線區域的文化符號進行交流與融合。隨着一系列方案的出台，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符號在縱橫交錯中構成了國家文化形象，凝聚成統一的文化符號，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中，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涉及15個省區市，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涉及8個省市，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涉及15個省區市，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涉及9個省區，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涉及13個省區市，除了海南、香港、澳門和臺灣，全國其他省份都肩負着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任務，有顯著的跨區域性質。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將國家文化公園作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並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重要途徑，在新時代的文化建設中，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標識。

¹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黃河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發源於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陝西、河南、山東九省區，全長 5464 千米¹。橫跨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黃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單元，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除滋養人群聚集較多的漢族之外，還哺育了 10% 左右的少數民族，串聯不同區域人民的生命文化等活動外，豐富着多元的文明系統。耳熟能詳的關中文化、三晉文化、河洛文化和齊魯文化都是黃河哺育的地域文明。途經九省區相關縣級行政區的黃河生態流域，國土面積佔據了 130 萬平方公里，以此為框架建設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地標體系將隱藏其背後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精神全盤托出。作為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工程，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具備塑造國家文化標識的重要功能。從實際空間中思考個體在現實時間中的經歷，社會文化演變的互動與傳承關係，是以國家文化公園為代表的新型公共文化場域存在的意義所在。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能夠充分調動黃河流域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系統地探索和詮釋黃河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一步鞏固沿岸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中國特色文化發展的自主舉措，主要包含四個範疇的內涵：“黃河”代表着空間和符號範圍，是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和中華文明的代表性符號；“國家”作為建設主體，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從國家視域中出發，積澱着深厚且優秀的傳統文化，代表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底蘊和精神；“文化”是建設的內容，通過公園的建設傳承與弘

¹程有為：《黃河中下游地區水利史》，第 45 頁，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揚文化，充分展示黃河文化的影響力，堅定文化自信；“公園”作為空間載體，從開放空間形式體現了建設工作的權屬和組織結構，蘊含着人民性、公益性和開放性的特徵。福柯說：“空間為權利提供運作基礎的同時也展現了權力，權力被作用於物質的空間，從而在集體中實現社會秩序的建立。”¹建立在龐大自然景觀與文化資源基礎上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囊括了多層級的物質遺產、歷史名村名跡、特色植被等，通過對流域周遭空間內的自然景物與設施的整合，構建出獨特而鮮明的黃河象徵意義系統。

當前對於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研究範圍，不能僅僅受限於如今的黃河地理流域，而應將古代處於黃河兩岸的地域也納入黃河文化圈的範圍內。因此，黃河國家文化的範圍包括現有黃河及古代黃河流經地區，主要包括禹河故道、西漢故道、東漢故道、北宋故道、南宋和元故道、明清故道。現行河道從黃河上游到入海口涉及青海、甘肅、四川、寧夏、內蒙古、山西、陝西、河南、山東九省區，古代黃河還涉及今河北、天津、安徽、江蘇以及北京等地。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以黃河為核心，為眾多文化元素賦予了一個共同的名稱並呈現出多樣的特色。作為公共文化載體，國家文化公園具備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遊觀光和休閒娛樂、科學研究等六大功能。其中，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國家文化公園能夠確保寶貴的歷史和文化資產得到有效地保存和傳承；文化教育能夠促進公眾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理解，提升文化素養和文化自信。黃河流域作為歷經三千多年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遷的中心地帶，肩負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責任。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資

¹ Michel Foucault.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 James Faubion.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86.

源為公園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底蘊和創造力。通過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黃河流域的文化價值得以凸顯，並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和發展貢獻力量。此外，通過科學研究，可以進一步挖掘和解讀黃河文化的內涵，推動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深入挖掘黃河流域的文化特色和歷史演變，為主旨國家公園的規劃和管理提供科學依據至關重要。

二、作為文明秩序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國家文化公園的存在是對我國區域文化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的一種實踐模式。為有效推進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系統闡釋其概念與內涵的基礎理論建構在其中尤為重要。在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主體方針中，文化被視為其空間本質的屬性與核心要素。目前，我國共擁有四個重要的國家文化公園。它們的文化主題建設大都兼具多民族文明的融合與發展特徵，擁有較為明顯的文化標識與類型。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旨在保護黃河流域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促進黃河流域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其本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新梳理與傳播。“黃河連接了長城內外、東西之間，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都在此交匯、競爭乃至融合。”¹於此，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題該如何選擇呢？我以為這牽涉到第二個層面，即“作為文明秩序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從根源出發，要圍繞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將各個民族的文化吸收進來。

¹ 韓子勇：《黃河、長城、大運河、長征論綱》，第71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21年版。

英國考古學者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認為黃河流域最早具備了文明所需的三要素——文字、城市和禮儀，成為了世界文化的發軔之源。作為世界文化發展的起點和基石，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出現象徵着獨特的符號體系和表達方式，承載豐富歷史和文化資訊的同時輔助人類記錄和傳承知識；殷墟和商代遺址孕育着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經濟體系，推動着人口、貿易和文化交融。流域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外化着古代社會意識、禮制和道德觀念，周禮和禮記的的禮儀傳統構建着社會秩序、文化傳承。黃河文化流域背後是文化的強認同與趨同。甘青文化、河洛文化、海岱文化等將各個區域的文化精華，出現了城郭、農業生產社會化、禮制規範化等聚落形式，構成了完備的傳統文化思想體系。至此，不得不提及中華文明中的儒家文化。儒家文明之中曾言及“中庸”之哲思，其意所強調的“天人合一”之思在本質上與黃河文明擁有着內在聯繫。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為人處世之道，強調“天人合一”思維模式和“萬物一體”的生命關懷意識，這與中華民族的宇宙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息息相關，蘊含着華夏民族尊重生態與熱愛自然的生態倫理思想。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自身心靈的和諧共生共存，不僅關注自然生態，更注重社會人文生態和身心感受。換言之，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傳統理念的滋養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汲取了智慧能量，傳承紅色文化基因，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流文化。豐富的文學、藝術等蘊含的哲學和倫理道德成為創造性的語言表徵；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保持了黃河文化的延綿不絕；折射特定文明的核心理念凝聚了中華

文化的統一性和向心力，產生了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同時，也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超越了民族、種族、地域與國界，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從對於不同歷史時期黃河文化研究中，挖掘並提煉出核心要素與文化精神，通過梳理與昇華建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在文化遺跡、歷史文獻和民俗禮儀等不同載體的作用下，向大眾傳遞黃河文化精神。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在注重“文化”內核的同時，其媒介“傳播”是實現價值的關鍵環節。“文化除了發明產生外，傳播是唯一延續的路徑。”¹從黃河流域文化資源呈現集中少、地下多、分散多的特徵中可以看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構建了富有特色的傳播與表達體系。首先，通過學術研究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理論體系進行溯源與闡釋，將其地域文化特色充分發揮出來，進而在世界表達和國際交流中弘揚黃河文化。其次，人民性的核心奠定了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大眾傳播與通俗表達路徑，通過這一載體展現豐富地域特色的黃河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共同體，黃河文化系統形成了一種多維度、開放性的網狀結構，不僅包括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生產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自我價值與文化觀念。對於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而言，居民不僅僅是地方文化與記憶的承載者，同時也在其中發揮着紐帶的重要作用。他們通過參與、實踐和傳承地方文化，進一步鞏固着集體認同的紐帶，為構建國家文化公園作為記憶場所、推動更廣泛地域範圍內的文化認同提供了堅實基礎。原住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價值觀與社會習俗與歷史物質遺存綁定在一起是確保文化多樣與活力的源泉。在此基礎上喚醒文化記憶，挖掘黃河文化的當代

¹ 李鵬程：《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詞典》，第64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性與公共性。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具有高度的文化符號與認同體系，記憶喚醒、構建文化認同層面極具整體特性，當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不同流域文明集合時，一種外張的“超我”文化號召力及此生成。

“文化記憶是一種體制。它被抽取出來、對象化，然後存儲在一些象徵形態中。”¹ 通過記憶的載體傳承黃河文化，通過歷時性記憶形成認同。文化記憶理論是 20 世紀 80 年代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提出的，該理論的基礎是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在 20 世紀 20 年代提出的集體記憶理論。哈布瓦赫第一次將記憶從心理學研究引入了社會學研究，認為人的記憶要在集體的框架下進行，並對記憶與歷史的區別等問題進行了探討。20 世紀 80 年代，德國興起了新記憶研究，代表學者即古埃及學家揚·阿斯曼和英美文化學教授阿萊達·阿斯曼，他們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文化記憶概念，並對其進行了闡釋與理論梳理，從文化學視角探討了記憶的延續性，記憶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聯。在文化記憶理論視域下，“文化公園精神”在文化記憶中進行着視覺重塑，並為建立一種新的文明秩序提供了可能。歷史與文化的記憶，形塑了當下集體記憶中的一部分文化結構，在黃河文化的現代集體記憶的發生場所中建構着當下集體記憶中的文化內容。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應該積極利用廣播、印刷、照片、電影等“熟媒介”，為大眾的感官提供大量的資訊，在身份認同中構建記憶空間。多元媒介的存在有效傳達着黃河文明的歷史與精神內涵，促進着公眾對於黃河文明的認同與理解。借助這種方式，黃河國家文化公園能夠成為一個集體記憶的容納之所，激發大眾對歷史思考的同時推動

¹ [德] 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寧：《文化記憶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譯，第 181 頁，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 年版。

着記憶的傳承與保護。集結不同流域文明符號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承載國家文脈，將歷史與傳統延續至今，借助獨特的文化景觀和活動激發着集體記憶。在推動文化研究、培育文明認同層面此空間的構建極具深遠影響與意義。

三、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從歷史到當下，在新時代語境中，應如何觀照黃河國家文化公園，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因此第三個層面指涉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自2017年《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正式提出建設“國家文化公園”以來，對長城，大運河，黃帝陵，孔府、盧溝橋、黃河和長江等具有文化傳承等特性的歷史遺產進行建設提上議事日程。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江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國家文化公園在贏得更廣泛的共識下成為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要延伸標識。在其建設過程中，以國家主導的宏觀格局為本，向內以文化本身所帶的情感關係為權屬邏輯，構建具有強大文化圈層影響的文化公園，展現了越來越大的形影和神韻。當這些具有標示性文化的子系統符號凸顯後，大眾在其中便形成越來越強的文化認同感。由此也可看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綱領性檔案的落實，不僅科學、持續地推動國家文化公園的實體產業的發展，同時也成為從話語、思維到心靈意義上進一步促進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舉措。

保護和弘揚黃河文明、延續歷史文明脈絡、依據時代特徵講好“黃河故事”從而堅定文化自信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與職責。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具有深層次、向外輻射性的挖掘價值所在，是恰當表達炎黃子孫的內在品格與良好品質的空間載體。在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中需要促進黃河文化旅遊發展，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譜系，從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入手，保護黃河文化遺產，建立相關數據庫，實施數字化戰略舉措。從文化內涵與形象表達上推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形象標誌，通過網絡媒介來擴大宣傳覆蓋面，增強文旅品牌的視覺識別程度；在文化生態系統方面，黃河國家文化公園也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生態系統，通過解析文化內涵與結構，探索文化與人類、環境的互動關係。黃河承載了燦爛多元的文化和複雜的地理景觀，理清其流經之處地理空間的地表構成、文化交往秩序帶的架構更能揭示“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的根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黃河流域生態安全與沿線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關，從上中下游的生態策略中精準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積極保護、有的放矢、因地制宜、親近大眾、活態展示、創新發展”進行有機結合更能向世界展示真實燦爛的中華文明的本真。保護和傳承黃河文明的精神和價值，需在維護其原有特色和本質特徵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文明的原創性和時代性統一、系統性和主體性的統一。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大河文明的理論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還需充分發掘黃河文化資源的文本價值、展示價值和體驗價值。因此，整合黃河流

域的文化產業體系，導入黃河沿岸黃金旅遊帶地段特色，形成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產業空間佈局。長遠來看，在促進中西方文明對話上具有重要的推進力量。

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是中華文化精神的國家聖地，也是成為推動文化融合和高質量發展的創新高地。根據黃河上中下游地區不同地方的特點和文化內涵，將其打造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標誌性地標，是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舉措，也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根”與“魂”，黃河文化成為國家氣質與文化魅力的代言人，在電影範疇中發揮其重要作用。通過拍攝黃河流域的歷史典故、民俗風情、神話傳說等文化，將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相統一，達成一種生態的平衡。2021年6月，文化和旅遊部發佈十條黃河主題國家級旅遊線路，在區域協同合作中進行民族文化生態遊。除此之外，在黃河文化視覺形象的構建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應堅持“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戰略，打造黃河文化的IP形象，例如古都文化IP、名人文化IP以及武術文化IP，用原創IP講好“黃河”故事，塑造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黃河文化品牌形象。在“自我”與“他者”的文化認知主體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成為展現中華文明關鍵性特徵，呈示國家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在國內形象與國際形象中，形成對立統一的雙重形象，在開放空間和開放文化中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旅遊帶和新高地。文明的傳播是一場遞進式的運動，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存在對於中國黃河文化和文明的傳承、發展和推廣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歷史意義。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黃河國家文化公園

建設增強了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信心，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特魅力、革命文化豐富內涵、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時代價值。

四、結語

黃河文明的復興、再思與重述，是中國文明在世界話語體系中轉換主體身份的重大舉措。將“天下大同”的世界大局觀和盤托出，超越不同民族文化界限的同時、重新思考他民族國家及意識形態在世界觀上的差異。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所提倡的命運共同體價值觀是推動全球文化相互借鑒、交流、融合和發展的重要力量，於建設的空間意義而言，這是中華民族在國際秩序上尋求文化公平的一種態度和表達。對黃河國家文化公園進行另一層面的深度剖析並做出闡釋，分析其作為主體實踐、文明秩序及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的存在價值與意義，是向公眾展示中華民族集體智慧、民族性格與民族精神的系列業態和手段，於傳播黃河流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實在是必然的。我們的信心相同，目標一致，讓我們共同努力。